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撰著

中国政治思想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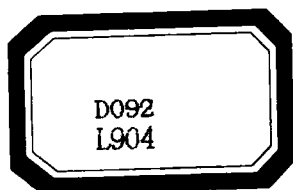
吕振羽 著



人民出版社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撰著



中国政治思想史(上)

吕振羽 著

《人民文库》出版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人民文库》第一批以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图书为主，

分为以下类别：（1）马克思主义理论，（2）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人文科学（包括撰著、译著），（4）人物，（5）文化。首批出版 100 余种，准备用两年时间出齐。此后，我们还将根据读者需求，精选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

由于文库入选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一方面为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将原来的繁体字、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另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对于有些入选文库作品的版式、编排，姑仍其旧。这样做，也许有“偷懒”之嫌，但却是我们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作品恒久价值的一片用心。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我们深知人民出版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再创人民出版社的辉煌。

《人民文库》编委会

初 版 序

本书原系我所编《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稿修改扩充而成的。在系统上和原来的讲稿比较,虽没有过多的改变,然已不仅有详略的不同,而且对于历史上各派思想家所代表的阶级立场,都有重新估定的,自不免有结构上的部分变更。

我原先并没有打算把这部讲稿整理出版,后由于许多朋友和同学的鼓励,才提起我这种勇气。本来,在没有产生一部较系统而正确的中国社会通史前,无论中国政治史、军事史、法制史、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各部门的研究,要那些对中国社会史(至少经济史)没有素养的学者去担任,实无异“大海捞针”,难以摸索着条绪的。何况在时代悠久、文献“浩如烟海”而又真伪并出的情况下,更将增加研究的困难,也是无可讳言的。我是研究过中国社会史的人,无论我的见解正确与否,总算曾找出了一个粗略系统。因之,在拙著《中国社会史》没有完成前,提早整理《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供从事中国史各别部门研究者的参考,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课程下,给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发展以初步的估计,以及从历史上来给予时代以较系统的暗示,又是我的一种不可逃避的义务。

本书包括的时代,系从阶级社会的殷代奴隶所有者时代开始,贯穿着封建制的全时期——初期封建制、专制主义的封建制时期,以至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过渡的时期。我企图对这长时期中社会思想

的各流派,从其形成、发展、死亡的过程上,以及其相互对立斗争——作为各别阶级的本质的对立和同一阶级内部各阶层的统一对立——的关系上,作系统的探究。不过关于近百年这一部分,我尊重出版者的意见,不包括在此次出版的这部分之内,拟另于短期内出版。这是我自己引为歉仄的,谅读者必肯原谅。(补注:接近百年部分的稿子,已于一九三七年平津沦陷时被焚。)

我的编著体裁,根据我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初步结论,首先把中国史全部过程划分为各个阶段,各个阶段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的阶级阶层的构成上以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上去论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又把每个流派中各思想家的思想,作为其自己的一个体系去论究。所以我的原意,是在学习《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精神去编著的,结果自不免“东施效颦”。(补注:本书原和我所编《中国经济史讲义》是姊妹篇,所以对历史各阶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及阶级构成、阶级关系和其变化,在这里没有详论。在没有觅得《中国经济史讲义》整理出版前,暂请读者去参考拙著《中国社会史纲》。)

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一部门的研究,前此已有些断代或全部的著作,但马克思主义者对这方面研究的历史还很短,有些研究者虽企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而由于运用上的错误,没能作出正确结论;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由于其立场和方法论的关系,都未能得出较正确的结论,像梁启超等人的作品,在当时曾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到今日却已成了落后的东西;那些由假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的托派汉奸作品,不独由于其方法论的错误,而且由于其别有用意的卑鄙阴谋,其作品便完全是反科学的有害的东西,不当作为学术研究来看的东西。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能比较令人满意而符合时代需要的产品。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思想作一较正确的总估计,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民族现实的实践斗争上,在民族文化传统之批判的继承的要求上,又是一件不容缓的事情。这部拙著还不是以中国民族文化思想的全面考察为范围,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部门。其是否能获得较多的同情,比较能符合时代

的要求,那只好期待于事实的反响。

二

百年来,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中国思想界及其对民族文化思想的估计,适应于社会诸阶级阶层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有着各种不同的立场和流派。

自五四运动起,成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一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运动,便成了中国文化思想运动的主潮。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旧文化思想,自始就表现一种严肃的态度、正确的立场,自始就在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科学方法去加以估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只反对过时的、死去的或行将死去的旧文化思想,而且要求批判地去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即那些有现实意义的、有生命力的、积极的进步的东西,而加以发扬。五四运动时,李大钊的《今》和《青春》等论文,就开始表现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民族文化思想的倾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其机关杂志中所发表的一些历史论文,基本上便开始表现了对民族文化正确处理的方向。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极困难极险恶的环境下,也努力进行了对民族文化思想的探讨工作,虽只是个别的少数人在进行,成绩也并不太大,然却理出一个初步系统,也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文化何等重要!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不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模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具体环境具体斗争中的发展,是可以应用于一切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指导原理、具有相同特点的世界其他国家人民革命的指导原理。而且是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结晶,是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之继承的表率。就文化革命方面说,他不仅正确地估计了民族文化,提出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创造民族新文化的方针和任务,而且把它贯彻到党、政、军、民各方

面的实际行动中,至今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成为支配文化生活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的现实东西。由此可见,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重视民族文化,才能科学地认识民族文化、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因此,深入地展开对民族文化思想之史的研究,把研究的结果提供到实践上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必要的课题。*

三

中国民族哲学思想的传统,是相当丰富的。世人常是这样说:“日本民族没有其自己的哲学,中国人却是富有哲学思想的民族。”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然中国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封建制所经过的时期分外久长,而产生了较高的封建主义文化,所以在封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形势一再得到缓和的基础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哲学的儒学和道学,都获得一再反复的发展与阐扬,佛学虽产生在印度,然而在中国始获得其系统的较高的发展。可是无论何种哲学思想,虽然有由于其民族所处地理环境等关系所给予的特殊性,以及由于历史传袭等关系所给予的特殊性等基础上,会给予其民族的意识形态如哲学等以特殊的色彩;但在其根源上,作为精神产品的哲学等东西,其本质却不是民族的,而是阶级的。

过去儒家对历史上各种社会思想流派的分野,一贯地分别为所谓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杂家……等所谓九流百家,此外还有后来的佛家等等;这完全把社会思想存在之根据的阶级内容隐蔽了,结果自然不能说明其本质。从五四运动开始,资产阶级各派学者,应用不彻底的、虚伪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思想史,最初从事这种研究的,在中国为胡适、梁启超、李石岑等,在日本有渡边秀方等。但他们对

* 这两段,在一九四三年修订时有所增删,如文中《新民主主义论》等等,都是修订时增加进去的。

社会思想流派的区分,完全承袭着儒家。从他们的成就来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曾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然而根本没有触着各派哲学思想的本质;而且在“上册”出版后,便不能继续下去,无异宣告其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彻底失败。梁启超在形式论理学方面的素养上,还似乎比胡适高明些;他对“先秦思想”研究的著作,在当时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但也同样没有触着“诸子”思想的本质。李石岑在实验主义的阶段,对中国哲学思想并没有研究出一个系统来;在其逝世前的数年间,便开始抛弃实验主义,企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去研究中国哲学史,这是一个值得钦佩的进步。渡边秀方的《中国伦理学史》等书,却不但把中国社会思想各流派的本来面目隐蔽着,而又把它庸俗化了。虽然,在半殖民地文化支配下的中国学术界,“宗主国学者”的意见,却容易获得人们重视,所以像渡边那样无价值的著作,也公然在中国流行。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工作者和进步的学者,才试图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来从事这一课题的系统研究。然其中有些人在其主观上虽也想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客观上却没能完成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他们,第一、由于其对中国社会史概念的模糊,自始便没有从社会经济构成及其变动的基础上,以及社会阶级构成阶级关系和其力量对比变化的基础上,去论究各派思想发生的根源和其本质,第二、他们应用的方法,自始就表现经济主义的倾向。他如陶希圣、李季、叶青之流为着反对马克思主义,便伪冒历史唯物主义的招牌,来贩运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商品。所以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不只表现概念上的极端模糊,且自始只从政治原因上去解说其所谓“政治思想”,并没有半点“唯物辩证法”的韵味,只是半实验主义化身的绝对唯心主义。而他正是企图以此来麻痹青年的。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基本上并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应用假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来破坏革命。由假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的王宜昌的一些历史论文,把中国民族文化曲说为毫无生命力的僵尸,谓没有外力的撞击就不能有丝毫的进步性。这也不是什么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他们在

响应日本法西斯军阀的对华侵略。叶青的《胡适批判》等,是应用假马克思主义加假三民主义观点写成的,更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其向日本法西斯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特务机关的陈情书;假马克思主义,是他寻找主子的本钱,假三民主义观点是他乞取主子录用的荐书。所以他故意抹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文化思想运动的进步性,故意曲解中国古代哲学,抬高保守的落后的封建思想,都不过是他迎合其特务机关主子的观点之一方式。

我在本书的基本出发点是:

哲学思想,虽能作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基本上却是被决定于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形态,并与之相适应,随着其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哲学的儒学、道学和佛学,在其各自的本质上,虽通过全封建时代都是相同的,然而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期过程,以及其在过程之中不断的部分的质变,也同样在起伏着、变化着。同时,由于其阶级内部各阶层间以至阶层内部矛盾的存在,所以同是封建地主的哲学,而有儒学、道学和佛学的分别,在儒学、道学、佛学各自的内部又有其流派的歧异;又由于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变化,有时表现儒、道、佛三者的相互对立,有时表现三者的统一,有时表现儒、道思想的统一与佛学思想的对立。这不过是一方面的例子,即足表现历史自身的生动性,不是机械般可以把握着的。

四

本书的出版,完全由我自己复校过。但在时间的仓促中,或仍不免有鲁鱼亥豕之讹。

当我写本书的时候,承许多学术界先进朋友给了我不少指示和帮助,尤其是吴检斋先生给我的帮助更多。又我的弟弟持平曾从自然科学方面说明光、音、电等的运动法则(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法则——虽然持平并没有学过唯物辩证法),贡献我作为哲学原理的参考。又

本书原稿大部分,承袁炎烈、李邦彦两先生为我抄写过,我应该向他们表示谢意。

一九三七,二,二八。著者自识

一九四三,三,二一。修订

修 订 版 序

本书的初版稿,是一九三六年在南京匆忙中整理完成的,一九三七年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发行了五千册;一九三九年在重庆,曾改订了一次,由桂林文化供应社接受出版,到现在还没见发行。

现又就初版在文字上略加增减,并改正了我自己所发现的一些错误看法。但自己仍感觉太草率。我胆敢把它付印,意在贡献给读者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一种参考资料;同时,抛砖引玉,我也可借以获取读者的指教,以便重行删订。

一九四三,三,二一。吕振羽自序

修订版再版代序*

辩证唯物主义指明：世界是统一的、物质的整体，在自然界中、社会中存在着共同的辩证法规律；自然现象的联系与相互制约，是自然发展的规律性；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与相互制约也不是偶然性的，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体现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科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伟大导师斯大林教导说：“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这样的力量……便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谋得方式，便是社会生活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中文版，第一五一页）而生产方式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体现，生产力又是其中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变更和发展，首先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上开始的。

社会意识形态是为生产方式即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教

* 这是我一九五一年四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政治理论教员讲习班的讲授提纲，由《东北日报》以《论社会思想意识》、《我们伟大祖国的伟大文化遗产》为题，陆续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四日、十五日刊登过，又曾收集在《史学研究论文集》里面，现略加节删，以此文作为本书增订版再版代序。又本书这次再版，承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语文系的韩元符、杨振声、单庆麟诸先生为我全部校对了一遍，特向他们表示谢意。——著者，一九五五年五月。

导说：“物质生活底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们底意识决定人们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们底社会存在决定人们底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于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转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中文版，第一六四——一六五页）因此，在历史上，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建筑于其上面的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法权、艺术、哲学、宗教、伦理等等。因此说：自然、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思维、意识是第二性的；在社会现象上，社会物质生活是第一性的，它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客观现实的反映、存在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作了光辉的发展。他教导说：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二八一、二八二、二九五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由实践而来的反映与认识的深

刻性,“……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同上书,第二九五页)的规律性,直接从事生产的人们对社会历史的伟大创造作用,革命的阶级对社会历史的伟大创造作用,现代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和领导地位。那种轻视生产劳动、轻视革命阶级的作用的思想,认为人类知识纯由于天才者的发现、发明和“英雄造时势”的唯心主义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根据的。归根到底,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创造的,人类的一切知识也都是劳动创造的。

二

历史唯物主义断言:社会思想、意识依存于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总是先行的,思想、意识的产生或变革常落后于社会存在。斯大林说道:“显然,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发生变化,然后意识和其他精神现象才相应地发生变化,——观念方面的发展落后于物质条件的发展。”(《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五二页)他并指出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发生时,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发生了;社会主义观念还没有产生时,生产过程已经有了社会的性质。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以前,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当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还只作为一个“自在阶级”,经过无数自发的斗争后,才产生马克思主义。当资本主义进入其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实现了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才由列宁和斯大林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当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才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正如伟大导师列宁在其经典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论述,俄国怎样经过半世纪的辛苦阅历,“才挣得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和“在这个异常坚固的理论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布尔什维

主义”(《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六九三——六九四页)。我国从鸦片战争算起,整整经历了八十年的辛苦阅历,才挣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才在这个异常坚固的理论基础上产生出毛泽东思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社会变革以后,旧社会的思想意识,总还是多多少少或久或暂的残留着。这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苏联、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目前的我国,都可以看见这种情况。因此,在无产阶级革命或由其领导的革命获得胜利后,对人民群众以至无产者本身的思想教育和改造,便成了最重要的任务。列宁曾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将要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几十万职员、官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是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斯大林在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中也早就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底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展开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精神下教育新一代和重新教育旧的一代的工作。旧社会遗传下来的旧的积习和习惯、传统和成见是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它们,这些积习和传统,束缚着千百万劳动群众……”(《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六卷,第二四八页)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我国,毛泽东同志也不只一次地像列宁斯大林一样的讲过。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为何把思想教育问题提得那样高。

社会意识的产生和变革常落后于社会存在,却并不与马克思主义的预见相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及其他天才领袖,根据那些已经存在或至少已在形成过程中的物质条件,掌握客观世界运动的规律,提出当前所能够解决的任务,指明斗争方向和历史前途。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见完全是科学的,是合乎客观规律的。

但是,不能因为归根到底社会意识为社会生活的经济的、物质的条件所决定,就认为是被直接决定的,就否定观念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及观念的继承性在社会意识发展中的意义,就否认其自己的发展规律。恩格斯说过:社会意识的每种形态,不论哲学、艺术、法权、道德等等,在每

个时代都有一定的思想上的材料作为其先决条件,这种思想上的材料为其前一代所传给,而社会意识的每种形态则从这些材料出发。举哲学为例:“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常能够在哲学上起领导的作用: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对于英国(法国人就是立足在它的哲学上的),后来德国对于前两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四七页)从另一方面说,今日帝国主义诸国家中,美国经济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美国的哲学、艺术、道德等等,却反而更加庸俗、颓废、腐败、反动和落后。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只承认人类伟大文化遗产的伟大作用,而且善于从那些先进思想的伟大观念中,吸收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的积极作用,才能正确地理解: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及其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才能正确地理解:人类对历史的能动的创造作用,革命阶级和伟大人物伟大思想对社会前进的推进作用,反动阶级和反动人物反动思想对社会前进的阻挠作用,这也就是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加速或阻碍作用。否则,就不能正确理解像法西斯思想及其他反动思想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罪恶,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杜鲁门、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蒋介石之流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罪恶以及帝国主义、国民党一类反动集团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罪恶;反而会归咎于社会规律,要历史来替他们担负罪责。因此就势必轻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轻视对一切反动思想的斗争。同样也就不能正确理解历史上某些对社会前进及人民生活起过积极作用思想和措施的进步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全人类空前无比的光辉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这些无比伟大的人物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推进作用;中国革命为什么在机会主义领导下遭受损失和失败,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就获得今日这样光辉的胜利,使我们祖国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政治的军事的强国之一。因此,就势必抹杀历史,就势必减低对领导的信赖,轻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错误思想的批评、对群众的教育。由此就